

## 宗教、文化的交谈与和谐

### ——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

顾卫民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072)

**摘要:**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 尚未建立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天主教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与一般民众, 至今大都不能认同天主教思想, 仍然视之为西洋宗教, 天主教与中国思想的交流一度因“礼仪之争”而中断, 近代以来, 它与中国文化仍然处于由互相排拒到互相探索认识的过程之中。天主教对于中国思想界, 迄今为止可以说几乎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作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天主教只有在进入中国文化当中深深扎根, 它必须经历一个与佛教相似的过程, 与中国传统的本位儒家思想相融合, 采用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 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

**关键词:** 天主教 中国传统 排拒与融合

**中图分类号:** B926.1      **文献标识码:** A

—

宗教与文化交谈的问题, 首先牵涉到的就是交谈对象和时代的环境。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 文化是生活的形式。尚未开化的民族, 具有较为简陋的生活形式, 然而这种简朴的形式, 适合于这些民族所处的环境。进化较快的民族, 则具有由科学和艺术构成的较为复杂和精致的形式。然而, 每一种文化或是简陋, 或是繁复, 都应受人的尊重。

宗教则是一种信仰, 它具有普世性。天主教尤其如此。信仰是文化的原理, 皈依者在内心应该是虔诚的, 外在的生活, 也应该表现出这种虔诚。具有天主教信仰的皈依者, 在内心的价值判断以及外在的行为方式上, 都应以信仰为标准。因此, 皈依者的生活方式与其皈依之前, 应有所不同, 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 这种新的方式, 并不是与皈依以前截然不同, 完全割裂, 因为人们不可能完全摆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遗产以及环境, 这种新的方式, 只是按照信仰加以修正, 补充和成全。

如果按照这样的看法, 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 尚未建立一种具有中国色彩的天主教文化。天主教既不属于中华文化的主流, 也没有在中国民族中深深地埋下种籽或迅速地传扬, 这种事实, 在亚洲其他国家的传教史上, 也可以看到。

在另类情形之下, 一个古老的宗教信仰, 进入了一个民族的文化, 信仰的传播十分迅速, 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即可作为见证。

佛教在公元二世纪, 已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 以后汉至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统一帝国, 佛教已传遍中国, 寺庙林立, 僧侣众多, 一般的民众风行草偃, 都成了释迦的信徒。

佛教僧侣作了两件大事, 以使佛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第一是译经。佛教的译经历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四百年时期, 那时长安与建康广设译经道场, 西域僧人频频来华, 中国高僧也历尽艰辛, 风尘仆仆往域外求经, 取回经籍以后又广作疏义, 于是中国佛教有五千 四

十八卷的《大藏经》，对于中国思想影响甚大 (1) (P5-11)。第二，佛教僧侣尽力将佛典融合儒家和道家之长，以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当时，中国社会经由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动，儒家的思想已经占了正统的地位，道家思想在民间也不失其影响力。中国的大乘佛教具有入世的精神，与儒家改造社会，造福于民的理想相吻合。而佛教僧侣又将“道术”“神人”等道家观念与佛教相契合，再加上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少数民族利用佛教作为征服中原的思想武器，由此造成了佛教盛传中国的内外条件。 (1) (P5-11)

## 二

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算短，不说唐朝的景教或元朝的教廷使节，就以明末耶稣会入华算起，至今已近四百年了。然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至今大都不能完全认识天主教的思想，中国民间至今仍以天主教为外来的西洋宗教。天主教对于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最早来中国的波斯景教僧侣曾经试图用佛教的语言和道教的观念来表达基督教的理念，早期景教的石刻艺术品中也出现了十字架与莲花座互为衬托的表现，甚至唐朝的景教一度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诚”的景象，但由于其上层的僧侣将过多的精力花在结交权贵之上而未向下层社会渗透，当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受牵连，并因缺乏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衰亡了。(2)(P27)

元朝时，由于蒙古军队的西进，罗马教廷曾派宗座使节东来通聘，1294年蒙高维诺(Montecorvino)来到大都而后创立中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区。蒙高维诺曾将《圣咏》和《新约》试译成为当地文字(蒙语)，在付洗的教友中也出现了像马祖常这样汉化程度很深的域外人。然而，天主教并未大行中国，这与当时时代环境有关。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王朝，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被置为异类，这种做法，使蒙古族的统治与汉族的社会与文化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沟壑，而当时教会的信徒多为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当以汉人为主的明朝推翻元朝时，天主教也随即消失于历史的舞台之上。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开启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互相沟通的先河。他们那一代人既忠实于上帝，又有足够的睿智与度量。因此，他们并不想将天主与中国社会对立起来。其传道之际，多取径于教义与儒学的沟通，不仅获得士大夫的友情，而且进入了宫廷之中。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的工作，无论从历史的或现实的方面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一，耶稣会在中国提倡科学，对当时封闭和落后的中国社会，无疑有借鉴的作用。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科学仍然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可以说这种知识传教策略至今并未过时。其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看出，中国社会建筑在儒家的传统之上，中国人的生活以孔子伦理为标准，耶稣会士经过研究以后觉得，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思想多相吻合，由此确立由孔子到基督的传道原则。这种立场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欢迎，所以李之藻在《天主实义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3) (P341-343)

耶稣会士的这种看法与魏晋南北朝佛教僧侣的看法不同，佛教僧侣是将佛教通过本土的道教传入中国，天台宗和华严宗都是籍道家之说建立两宗基本学说。但是佛教在中国始终受儒者的排斥，它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只限于民间的宗教生活，不能发展到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而利玛窦等人已觉察到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应包括人生各个方面，因此一定要和儒家思想沟通。可惜，由于“礼仪之争”等原因，当时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局面没有持续下去，天主教终为朝廷所疑忌，士民所排拒。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天主教虽然在中国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教会的活动很大程度与殖民主义的保教权和不平等的条约体系牵结在一起，这种局面，很容易使人指教会为帝国主义的先锋，在20世纪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形之下更是如此。在另一方

面，19世纪以后来华的传教士，虽然其绝大部分抱有真诚的宗教热忱，但是在当时弥漫一时的所谓“进步”观念的支配之下，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有意无意地漠视中国文化。西方人向中国传播教义，但老是希望接受教义的中国人与他们一样西方化。由此，传教士的中国语文训练，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培养，均被忽略。这种倾向，使天主教与中国结合成为难题。

有鉴于此，在20世纪初年，中国天主教会人士马相伯、英敛之，以及西方来华的教士雷鸣远、汤作霖等，极力呼吁改革教会的弊端。1917年，英敛之作《劝学罪言》，论及中国教支和神职人员在当时教会和中国社会中所处的可悲地位：

“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论其效果，不过自绝于高尚社会，自屏于优秀人群而矣。……处于不中不西之类缝中，故成此非驴非马之种类矣。”（4）（5）（P306）

马相伯和英敛之还上书罗马教宗，要求在中国兴办公教大学，上承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开启研习中国文化之遗风，倡导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沟通与融合，他们深知天主教要在中国社会扎根，必然融入本地的文化，正如上书中所言：“以往例今，圣教之广扬，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为一家之内，贵能有自食其力者，万不能专恃外债而生存也。”雷鸣远神父总结当时教会所应发展的方向是“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天主。”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声终于在1919年获得教廷的回应，是年，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它针对普世教会而发，却切中中国教会的积弊。通谕要求传教士尽量与本土的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同时应培养本地的神职人员以接管教会的权力，“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之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目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同时，通谕告诫，在异国为天主传播福音的人应当置母国的利益和光荣于教会之下，不要介入本国的政治：“假如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位身份，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权威出手中道之外而伸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用功极猛之疫症。”（6）（P384-397）

1922年，宗座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来华，他环顾当时教会的状态，曾这样感叹说：

“天主教在中国已经三个世纪，整个教会的圣统是外国人的。我看到，五十位分散在中国各地的主教，都是外国人，显然都是修会会士。基督的意愿是这样的教会吗？”（7）（P47）

上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将天主介绍给中国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不太愿意中国人与天主靠得比他们更近，这种矛盾使中国人不能成为中国教会的主人，天主教因之也成了客教。客教只是浮泛的东西，像水面上的泡沫，容易出现，也容易消散。因此，为了使中国人归基督，首先要使中国天主教会归中国人。

1924年5月，刚恒毅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主教会议，强调“本地神职人员只要有资格，决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1926年10月，有六位中国籍的主教在罗马被祝圣，到1935年，中国籍主教已达二十三个，中国籍神父已达一千五百余人。当然，与真正的本地教会标准相比，这种状态还相差甚远。以后的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的内战也从另一方面阻断了这一进程，即使如此，曲折而又缓慢的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毕竟减杀了上一世纪教会曾有的殖民色彩，从而增加了宗教本身主应有的感化和肃穆。

### 三

我国佛教史学者汤用彤在论及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与调和时曾说：

“外来思想之输入，常可以经过三个阶段，（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合而调和，（二）因为

看见不同而冲突，(三)因为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第一阶段内，外来思想文化并没有深入。第二阶段内，外来思想文化比较深入，社会上对于这个外来分子看作一严重的事件。第三阶段内，外来思想文化已被吸收，加入本有的文化血脉中了。不过在最后阶段，不但本有文化已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到这时候，外来文化已被同化。”(《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1) (P384)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思想的天道为基础，由天道的好生之德和宇宙的四时运动，达到人的生活准则：以中庸为本，以礼为规则，以仁为中心，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孝道为百善之先。这种伦理思想，从孔子到今天，中华民族常是遵守，成为中华民族的遗传，已混合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五四”运动以后，儒家思想受冲击，但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上，它仍然保留着很大的作用。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民族的生命常在民族文化的遗传中前进，民族的遗传也经常吸收外来的文化资料，同时保存遗传的中心部分，绵延生长。

天主教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指示人生的目的及达此目的的途径。宗教信仰是最高原则和抽象的伦理，它不是文化，但它必须进入文化当中，才能在民族以内长久存在。佛教在进入中国一千年以后，终于在宋朝理学兴起之时，真正渗入中国文化之中深深扎根。天主教进入中国，撇开元朝，自明末以来，有四百年的历史，最初耶稣会士的知识传教策略曾获得成功，然好景不长，因“礼仪之争”而中断，近代的历史又曲折多舛。可以说，自“礼仪之争”直到现代，天主教和中国文化及社会仍处于由互相排拒到互相探索认识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或许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天主教必须经历一个与佛教相似的过程，与中国传统的本位儒家思想相融合，采用中国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宗教。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宗座代表刚恒毅即已经看出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性，他说：

“天主教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不要只用西方经院派的那种理论形式，也要用中国哲学的那种形式，我们并不要把中国‘欧化’，只愿使他‘基督化’。这种尝试是绝对可以实行的。……宗徒们曾经接受了罗马富于文化气氛的方式，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中国也这样做？”

又说：

“传教士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并没有这样的职务要把欧洲的文化移植到传教区去；他却应该使那些民族，有时它们有数千年光荣历史和文化的，准备接受基督生活的习惯和因素。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而且从中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7) (P170P331)

当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已经指明，福音的传播不应与一种特定的文化相联系。信仰与表达信仰的方式是可以分离的，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用本民族文化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一个普世的宗教信仰，因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9世纪盛行一时的由于宗教传播而造成民族不和与冲突的情况将在新的世纪时逐步减少，人们将越来越习惯用宽容与平等的态度审视世界上的文化与宗教现象，从而在文化事业方面有力地促进人类的和平。

####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与开封犹太人[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 [3] 罗光.牧庐文集(四)[M].台湾:学生书局, 1997.
- [4] 英敛之.劝学罪言[M].
- [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6] 马相伯.马相伯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 [7]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M].台北:主徒会, 1980.

## The Conversation and Harmonious between Religion and Culture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Gu Weiming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

**Abstract** China hadn't still build Catholic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 i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So far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pulace didn't accept Catholic thought. They viewed Catholicism as west religion. The dispute between "Li" and "Yi" stopped the exchange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though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culture was in the course of rejecting and recognizing. To this day, Catholicism nearly was ineffective to Chinese thought. As a universal religious belief, it must mix together Chines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going through a course as Buddhism, using Chinese pattern of thought and life, and making national relig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atholic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Harmonious

收稿日期: 2002-10-15

作者简介:顾卫民,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